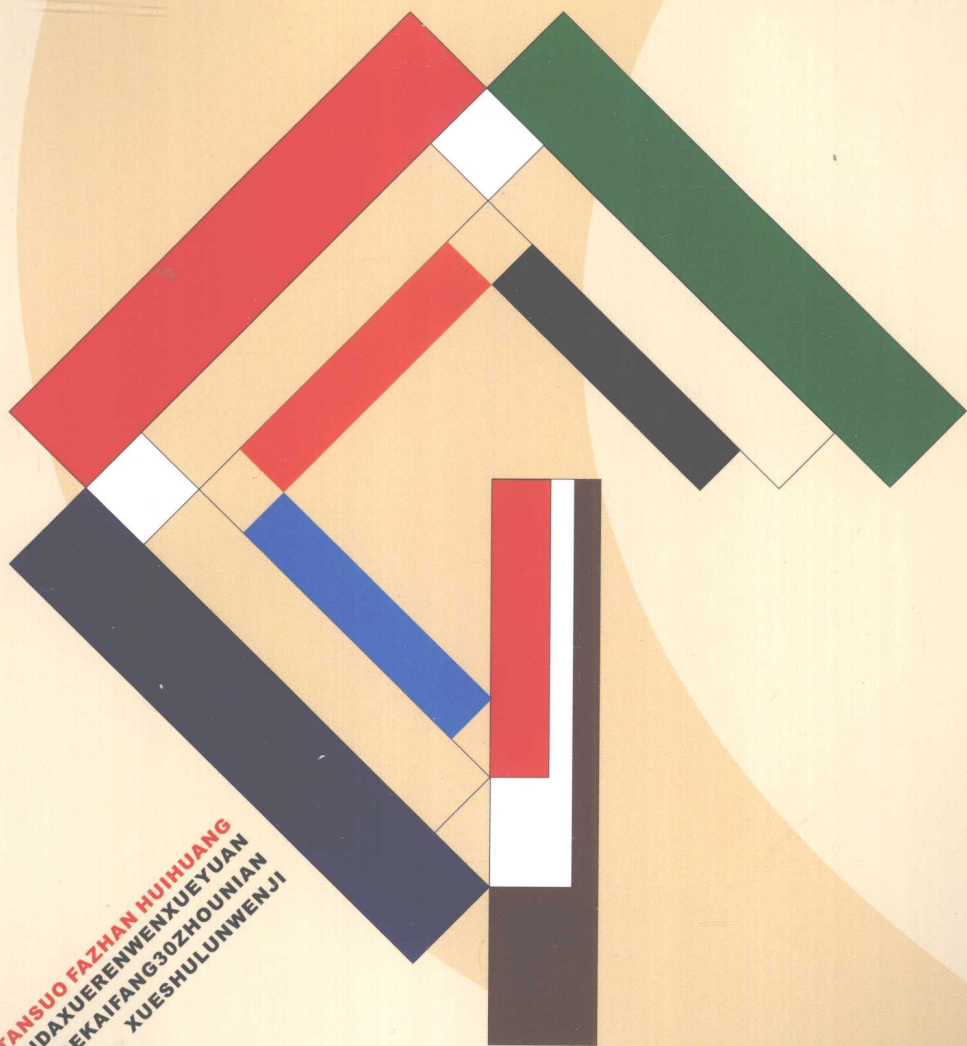


探索·发展·辉煌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论文集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 编



TANSUO FAZHAN HUIHUANG
CHANGDAXUERENWENXUEYUAN
JINJANGAIGEKAIKANG30ZHOUNIAN
XUESHULUNWEN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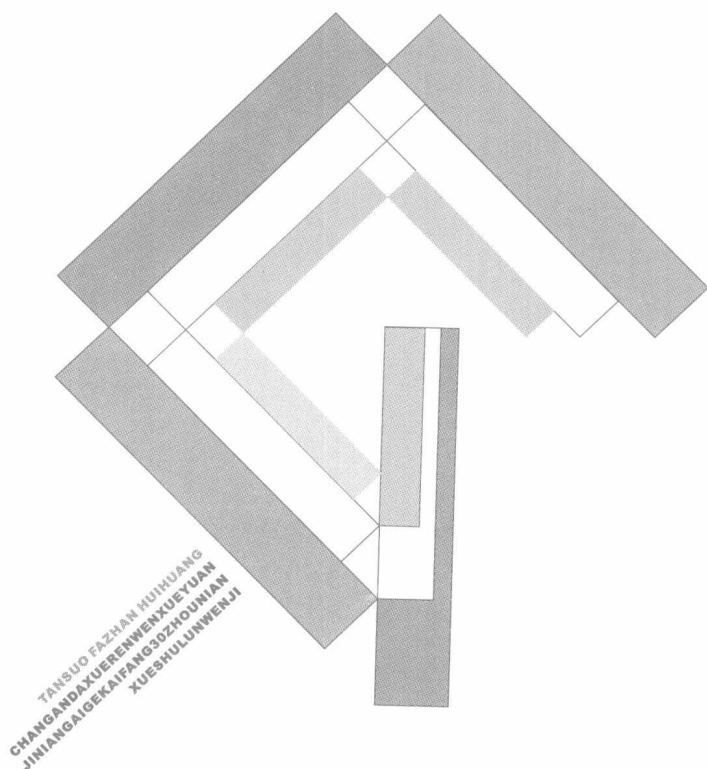


西北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探索·发展·辉煌

长安大学人文学院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论文集

王景荣 刘吉发 田 猛 主编



TANSUO FAZHAN HUIHUANG
CHANGDAXUE RENWENXUEYUAN
JINIANGAIGEKAI FANG 30ZHOU NIAN
XUESHULUNWENJI



西北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索·发展·辉煌:长安大学人文学院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论文集 / 王景荣,刘吉发,田猛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8. 12
ISBN 978-7-5604-2583-2

I. 探… II. ①王… ②刘… ③田… III. 改革开放—中
国—文集 IV. 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317 号

书 名: 探索·发展·辉煌

主 编: 王景荣 刘吉发 田 猛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通信地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710069 电话:029-88303313

网 址: <http://press.nwu.edu.cn>

电子信箱: nwupnsd@nwu.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陕西奇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2583-2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政治篇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纲·····	刘吉发(3)
苏东剧变原因的再思考·····	田 猛(11)
从马克思人本观的嬗变谈如何把握和坚持“以人为本” ·····	王立洲(17)
新时期三十年历史之我见·····	戴生岐 刘 俊(26)
邓小平政治与经济和谐发展观论析·····	桑业明(33)
科学发展观之“以人为本”的哲学意蕴 ·····	王 慰(40)
发挥政府网络公关优势,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	李 菲(46)
学习十七大报告,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 ·····	魏雪玲(54)
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和前景展望·····	李 莹 王凤霞(59)
简论自由·····	张 涛 张 乐(65)

经济篇

对榆林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 刘 强	柴丹璐(71)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创新型国家战略·····	张秋霞(78)
试论科学发展观 ·····	姜建芳(85)
科学发展观下的中国节能战略 ·····	胡金东(94)
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张月华(101)
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变迁的历史回顾 ·····	庞嘉林(107)

文化篇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要充分利用耻感文化 ·····	郭聪惠(117)
--------------------------	------------

试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原则	樊小贤(1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	刘晓宏(130)
高校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成因及教育对策	孔令华(135)
个人品德建设途径探析	丁永刚 周金玲(142)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质量实施新课程方案	何俊生(150)
论弘扬延安精神与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关系	杨美让(160)
关于高校科技创新体制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朱 煜 武小菲(168)
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背景透视及实践要求	宋小刚(175)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解放思想的历史经验	侯新养 刘兰英(181)
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促进陕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李海霞(189)
后 记	(194)

政治篇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纲

刘吉发

政治哲学作为人类政治思想的最高层面,是政治实践逻辑内化的思维结晶,表征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理性自觉。由于受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西方近代政治哲学脱离政治实践抽象地研究政治价值,同时往往忽视手段性价值孤立地研究目的性价值,将目的性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使其具有鲜明的唯心主义抽象性。马克思主义在合理扬弃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思辨性的基础之上,把政治哲学的理性视角投向政治生活的感性活动,从而实现了政治哲学研究视角的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政治实践作为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坐标,将政治价值看作政治实践的逻辑起点,将政治文明看作政治实践的积极成果,形成了“政治价值——政治实践——政治文明”的“三环结构”,进而完善了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构建了政治哲学的科学形态。

一、政治价值:政治生活的理性诉求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哲学的首要命题,是表征政治主客体关系的基本范畴,特指政治客体对政治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包括政治个体和政治组织在内的“政治人”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追求^[1]。政治价值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目的性追求,是引发政治实践的理性动因,具有强烈的政治主体性,它不在于实然地看待政治存在,而在于应然地审视政治生活,将政治实践置于政治主体活动的目的之下,给人类创新政治生活以理想和追求,给人类改造政治现实以勇气和力量,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源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并置政治价值的实践追求于政治发展的时代坐标之中,从而内导着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从政治价值的逻辑层面来看,政治自由、政治民主和政治权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理论的三维逻辑结构。

第一,政治自由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最高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终极性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是指受到宪法和法

律保障的公民表达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和实现政治意愿的权力。列宁在《我们的纲领》中指出：“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所以社会民主党应该把这两种斗争紧紧地结合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争取政治权利，争取政治自由”^[2]。可见，列宁在这里将政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并号召无产阶级为之奋斗。政治自由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目标具有历史的永恒性，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内涵和永久性理想的有机统一，它构成了每个时代的政治主体不断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从而推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从政治实践本原性的视角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自由的获取必须通过政治实践活动以摆脱政治生活必然性的奴役，增强人之为人的政治主体性，惟其如此才能获取真正的政治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自由的全部理解，最终都归结到政治实践领域，归结到追求政治自由的客观物质过程上来，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本性和阶级特征。

第二，政治民主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中介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阶段性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3]的政治理想，也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价值形态，深刻体现着人的政治主体性和主体平等性。一方面，人类通过对象化的政治实践活动，实现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占有，从而确证自己的政治能动本性，肯定自己的政治主体地位。政治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类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这个维度上讲，政治民主既是政治实践的价值诉求，又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手段选择，从而构成了人类政治生活价值与手段的统一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民主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目的看待；而在《恩格斯致爱·伯恩斯坦》中，恩格斯则将政治民主看做是实现其他政治价值的手段，他认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权也需要民主形式，……这种形式和其他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5]。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另一方面，在政治主体间的交往中，政治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恰恰要求把平等相待作为基本原则，从这个层面上讲，“平等在民主中处于核心地位”^[6]。在传统政治文明中，由于受自然经济的制约，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平等相处，致使专制政治一直主导着政治生活的全部

过程。在资产阶级政治实践的推动下,民主政治得以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受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的束缚,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注定只是少数人的政治民主;唯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政治民主,才是“完全的、普遍的、不受任何限制的”^[7]政治民主,才是政治民主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

第三,政治权力作为政治价值逻辑结构的基础层面,是政治主体从事政治实践活动所追求的工具性价值。马克思认为:“……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4],可见,政治权力体现了政治主体间的非对称关系。从逻辑维度分析,政治权力的运行具有特定的指向性:一方面,它是强势政治主体指向弱势政治主体的立体线性结构;另一方面,它是政治权力中心指向社会公共生活的圆形平面结构。这种权力指向并非仅是一维单向性结构,而是具有二维互动性特征,正是这种互动性的权力运行,才使人类政治实践不断推进,人类政治文明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政治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手段性价值在政治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将政治权力作为实现目的性价值的手段性价值,纳入到政治价值的理论视阈之中,从而弥补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价值体系的理论缺失。恩格斯在《工联》中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可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8]。由此可见,恩格斯在这里将政治权力看作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目的和价值追求,同时也视其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关系和被统治阶级改变政治关系的首要工具。纵观人类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轨迹,政治权力构成了贯穿人类政治实践的一条价值主线,私有制社会的统治阶级运用政治权力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无产阶级则争得政治权力并运用政治权力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谋福利,从而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力观。

二、政治实践: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

政治实践是指政治主体运用政治中介作用于政治客体的社会活动,其本质内容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关系的能动改造。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主体内容,政治实践是连接政治价值和政治文明的物质活动。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历史演进,

逐渐升华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从而构成了政治思想的理性层面,进而凝结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源于它的实践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4]。因此,从实践维度审视政治生活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关注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并对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等实践形式进行过精辟论述,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实践的核心内容,指导着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在人类政治实践的不断演进中,历史地沉淀出政治实践的逻辑形态,政治主体、政治客体和政治中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范畴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

首先,政治主体是政治实践的能动承担者,也是政治关系的能动创造者。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表现为两种存在形态:其一是个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个体,亦即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个体“政治人”。虽然每个社会人都是潜在的“政治人”,但是只有进入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人才是现实的“政治人”。个体性政治主体的典型代表是公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其二是群体性主体,它是指进入特定政治生活并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社会群体。群体性主体是政治主体的基本形态,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其典型代表是阶级、政党、民族、政府和利益集团等。在政治实践发展过程中,作为具有强烈能动性的政治主体,一方面提取政治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使之内化为自身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又运用自己的主体力量去克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旧的政治关系,创造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主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政治能动性,这表明了政治主体不仅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对政治生活的观念把握达到了理性自觉,而且必须进入特定的政治生活,并自觉从事政治实践活动,进而在互动性政治实践中改造旧的政治关系并承担新的政治关系。随着现代政治文明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呈现出“阶级性下降,民族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政治生活中除阶级之外,国内的政党和国际的民族也日益从政治主体的边缘向中心内聚,从而使政治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其次,政治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的作用对象,也是政治实践活动的客观指向。在人类政治实践活动中,政治客体可逻辑地分为两种形态:其一是观念性

客体,表现为维护旧的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观念存在物;其二是制度性客体,表现为体现旧的政治关系的政治制度,其实质是政治生活的制度存在物。从政治实践进行的逻辑进程分析,观念性客体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首要对象,制度性客体则是政治实践活动改造的重心所在。然而,对观念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又依赖于对制度性客体的彻底改造;制度性客体改造的成功与否,是政治实践活动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政治客体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对象性,这表明政治客体必须通过政治主体的能动改造,才能不断满足政治主体的价值追求。政治客体的本质是政治关系,是政治主体之间在政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稳定联系。政治关系产生于政治主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活动,并由特定的政治主体所承担,在政治生活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政治关系又因其不能适应政治生活发展的时代需要,从而构成了新的政治实践活动的改造对象。政治关系的这种自我否定,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活发展的历史辩证法。随着阶级对立关系的消亡和实践活动范围的扩大,政治客体的逻辑重心逐渐“由国内阶级关系向国际民族关系位移”,改善国际民族关系便成为现代政治实践的时代命题,从而使政治客体日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

最后,政治中介是政治主体作用于政治客体所运用的政治手段的总和,是联系政治主体与政治客体的桥梁和纽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中介同样表现为两种逻辑形态:其一是刚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政治上层建筑,它又可分为暴力型和规范型两种类型,暴力型政治中介是指以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武装设施为物质载体的政治中介;规范型政治中介是指以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政治中介。在革命战争年代刚性政治中介集中表现为武装力量,在和平建设时期刚性政治中介则集中表现为政策法规。其二是柔性政治中介,常称之为思想上层建筑,主要包括能够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教育,它旨在为政治实践的合理性和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思想基础。政治中介的本质属性是表现于政治实践活动中的工具性,这种政治工具的实践选择,不但表明了政治主体的能动性,而且体现了政治生活的文明度。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民主、法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政治实践的基本主题发生了重心位移,政治生活的柔性因素也随之不断增强,从而使政治体系逐渐软化并富有弹性,呈现出“统治性下降,管理性上升;暴力性下降,教化性上升;革命性下降,改革性上升;对抗性下降,和谐性上升”的新型特征。因此,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柔

性政治中介的地位逐渐上升并成为政治中介的主体内容,从而使政治中介日益呈现出柔性化趋势。

三、政治文明:政治生活的价值沉淀

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实践活动的价值沉淀,是政治主体在追求政治价值过程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表征着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文明程度。作为人类文明产生的最终标志,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演进的主导轴心,内导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既是人类文明分化的最高层面,又是联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间环节;既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又浓缩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精华^[9]。江泽民同志充分认识到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0],政治文明从此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价值目标,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政治文明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政治命题,它可逻辑地分为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大层面^[11],从而构成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其一,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内在灵魂,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观念升华,也是政治主体反映人类政治生活的积极成果,更是政治主体升华政治实践经验的观念形态,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柔性层面。政治意识既是政治存在的主观反映,又是政治实践的逻辑内化;既是政治活动的历史产物,又是政治行为的观念前提。政治意识文明作为政治文明体系的结构内核,规定着政治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维护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政治文明系统中起着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的作用。人类社会的政治存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随着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不断演进,政治实践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就不断升华为政治意识的逻辑层面,形成对政治实践活动的认知形态,政治哲学便是这种政治认知的最高层面。作为政治认知的思维结晶,政治哲学代表着政治意识的精华所在,必然会在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在政治实践推动政治认知深化的过程中不断升华。政治实践发展史正是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深层根源,政治实践的历史演进必然推动着政治哲学的不断发展,政治哲学的与时俱进正是政治实践不断发展的逻辑表征,无产阶级政治实践的历史发展,逻辑地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观念形态。

其二,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基本坐标,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行为规范,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有序程度,构成了衡量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历史标尺。作为政治意识文明的必然延伸,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从历史维度考察,政治制度文明作为政治生活的制度性存在,经历了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演进的历史转型,同时也经历了从人治形态向法治形态转变的时代位移,其变化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实践活动,这种建立在经济实践发展基础上的政治制度转型,表征了政治制度文明日益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时代趋势。资产阶级在推进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由于其本身的阶级狭隘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必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构成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历史演进的最高形态。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政治原则,坚持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生活的价值取向,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时代平台。

其三,政治行为文明作为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外在表现,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实践中追求政治价值的动态展示,体现着政治主体自身的内在素质和文明程度。政治行为是人们为达到特定政治利益而围绕公共权力所进行的社会活动,亦即“指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12]。如果说政治意识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生活的结果性文明,那么政治行为文明则是政治生活的过程性文明。从结果形态的静态文明到过程形态的动态文明,标志着人们对政治文明逻辑结构的深层反思。政治主体是政治行为的能动载体,政治主体的文明程度决定着其政治行为的文明程度。只有将政治实践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自觉内化到政治主体的意识之中,变为政治主体进行实践活动的理性指导,并自觉遵循政治制度的基本规范,才能构成政治主体的行为文明。把握政治行为文明,必须着眼于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符合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其二是要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政治主体互惠互利的价值原则;其三是要“有理、有序、有度”而为,亦即政治行为必须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三项内容互相关联、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构成了判别政治行为文明与否

的重要标准。

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科学形态的逻辑体系,除了具有一般政治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前瞻性”、“超越性”和“理想性”^[13]特征外,还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阶级性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发展的时代高度,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政治哲学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合理因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阶级性于一体,构建了“政治价值——政治实践——政治文明”三位一体的逻辑形态。从内在逻辑看,政治价值作为引发政治实践的理性动因,贯穿于人类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导着人类政治实践的发展轨迹,并随着政治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政治实践作为优化政治关系的物质过程,以追求政治价值为逻辑起点,又以提升政治文明为历史归宿,在不断变革和完善现存政治关系的过程中,升华出反应政治实践内在规律的政治认知,从而推动政治实践活动日益走向理性自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主体进行政治实践的价值沉淀,表征着人类政治生活的文明程度,它既是政治存在理想化的实现,又是政治理想现实化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丁志刚. 政治价值研究论纲[J]. 政治学研究, 2004, (3)
- [2]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6
- [3] 列宁全集(第2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53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93, 284, 56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61
- [6] 科恩. 论民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3
- [7] 列宁全集(第3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204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84
- [9] 刘吉发. 政治文明的哲学透视[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3, (3)
- [10]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553
- [11] 虞崇胜. 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J]. 政治学, 2002, (5)
- [12] 陆少青. 论政治行为文明[J].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 (3)
- [13] 王岩. 政治哲学论纲[J]. 哲学研究, 2006, (1)

苏东剧变原因的再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警世

田 猛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震惊了世界。震惊之余,世界各国及政党、相关国际组织、各类学术团体乃至不少个体,都在反思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这一前所未见的巨大谜团,力图从中获得借鉴。近二十年来,这份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在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是热点,认真研究,正确认识这一历史遗产,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苏东剧变主要学术观点介绍

导致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既有外因,又有内因;既有远因,也有近因;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军事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也有现实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带来的恶果;既有体制上弊端的作用,也有领导者个人品质与变节的原因。现将近几年流行的几种学术观点介绍如下。

(一) 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

这种观点认为: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多年来利用它们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不断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全面渗透,助长这些国家共产党内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千方百计地培植和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以经济等手段诱迫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不断作出重大让步,从而使之一步一步地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二)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直接插手东欧剧变

这种观点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谓“新思维”的鼓励和促进下,使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东国家党内迅速蔓延和泛滥起来,其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从而走向资本主义化。东欧各国领导人不按照前苏联模式进行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插手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搞下台,而青睐前苏联模式的就得到戈氏的支持和鼓励。

(三) 苏东国家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社会民主的发展,阻碍社会进步

这种观点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苏东国家社会一个典型特征,这些国家实行一党专政,指令性计划经济,思想高度垄断,排斥和拒绝吸取人类文明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导致民主范畴狭隘,干部职务终身制,经济效益较差的粗放型发展,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现象严重。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改革旧有体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 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败坏社会风气,引起群众不满

这种观点认为:苏东国家尤其是苏联发展后期苏共党内出现了一批享有“特殊待遇”的特权阶层高级干部,他们职务越高,特权越大,享有的种种物质待遇同普通群众之间的反差也越来越大,甚至他们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就能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这个特权阶层严重损害社会主义的声誉、制造了社会鸿沟、败坏了社会风气,引起群众强烈不满。这种官僚主义和特权腐败成为苏东国家解体的重大原因。

除上述列举的原因之外,苏东国家还存在诸如没有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没有慎重对待历史遗留问题和领袖的功过是非问题,缺乏健全领导干部制度和监督机制等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化,随着苏东国家对其早期文献、档案材料的开放,笔者对苏东剧变原因又有了一些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跟上实践和时代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思想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在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位伟人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如此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终极理论,它必须不断发展。遗憾的是,19世纪蓬勃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却在苏东国家终止了发展。本来理论应先行于体制和政策,但苏东国家的理论却远远地落在了实践的后面。理论没有